

# 考古学的中国深度:张忠培先生的文化 演进论

段天璟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长春 130012)

**内容提要:**张忠培先生始终深入田野考古,坚持“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在系统构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既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又体现人类共同规律的文化演进论。张忠培先生在坚实而高水准的实践起点上,不断开拓学术生长点,构建起了宏大的学术体系,创造性地开展和领导了田野考古实践工作,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学地发现和表述了蕴含着中国文化基因的谱系结构,展现出考古学的中国深度。

**关键词:**考古学史 文化演进论 张忠培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张忠培先生(1934—2017年)是中国当代考古学的主要领导者和导师之一。张先生为探索人类历史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学界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考古学思想仍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指引中国考古学与文物保护事业继续奋力前行。

张忠培考古学思想始于马克思主义,立足中国大地,植根田野考古,创新研究方法,定位学科发展,求索文明历程,引领文保理念,指导人才培养;既从实践上构建了中国考古学关于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国家形成等课题的宏大体系,又于理论上论述了中国考古学的基础方法、研究对象、学科局限等基本范畴,更在根本上阐明了中国考古学从哪里来、走过的路、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他发现、提出、践行了“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演进规律,实事求是地揭示了古代遗存的内在联系,阐释并总结成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又体现着人类发展共同规律的“文化演进论”“社会发展论”;他尊重和把握规律,传承发扬、不断创新,提出了指导考古学发展的“考古方法论”;他倡导将考古工作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中来,提出了引领文物保护理念的“遗产保护论”;他导人思考、激发智慧、言传身教、甘当人梯、培养人才,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考古教育论”。先生坚持真理独立思考,开放兼容反对教条,开辟出具有坚实基础、富有深厚底蕴的中国考古学之道。

张忠培考古学思想来源于实践,经过了实践的严格检验。他以宽广无私的学术胸怀、高屋建瓴的学术布局、辩证睿智的学术智慧,为中国考古学注入了灵魂。理论是思想的体现,方法是理论的延伸;个案研究应用了方法,支撑着理论。他始终亲自实践,进行了大量的个案研究;始终尊重规律,科学地创新了研究方法;始终实事求是,通过扎实的基础研究创建出系列学术理论。

田野考古是张忠培考古学思想的不竭源泉。他始终深入田野考古第一线,坚持“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在系统构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既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又体现人类共同规律的文化演进论,展现出考古学的中国深度。

## 一、深入实践的学术起点

1958年秋—1959年秋,张忠培先生参与主持了渭河下游的陕西华县、渭南两县的考古工作,试掘了老官台、南沙村等26处遗址,揭示出该地区前仰韶时代至东周时期的文化面貌<sup>[1]</sup>,重点发掘了华县元君庙墓地<sup>[2]</sup>、泉护村遗址<sup>[3]</sup>。这是他田野考古工作的开端。

收稿日期 2018-01-09

作者简介 段天璟(1977—),男,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先秦考古及考古学方法论。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7BKG020)资助。  
http://dnwh.njmmuseum.com/

张先生在这次田野考古工作中,进行了方法上的新探索。他完整揭露了元君庙墓地,显现出聚落研究的理念;使用某墓葬或灰坑在“某层下露出坑口”等术语把地层和灰坑、墓葬、窖穴等单位及其内部依土质土色区分出的堆积分为不同的层位,突破了当时流行的“某一地层所属单位”或“大文化层”的做法,为研究遗存共时的平面空间布局和历时的发展阶段贡献了客观精确的层位学方法。他从层位学提供的时间刻度出发,对比同一考古学文化各单位的器物组合,辨析具有分期意义的标准器形,以类、型、式的术语深入探讨遗存形态表达的功能、年代等意义及其文化源流、关系等问题,生动地体现了苏秉琦类型学的谱系思想。他在此次工作中产生了一系列新认识,确认了系半坡文化前身的老官台文化与河南发现的磁山、裴李岗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是年代相近的不同考古学文化;发现了晚于西阴文化的泉护二期文化,在元君庙和泉护村等遗址找到了半坡文化向西阴文化转变的线索,辨识出半坡四期文化。这些认识将李济先生揭示的西阴文化(即庙底沟一期遗存)、苏秉琦先生指称的开端庄“文化二”(即客省庄文化)等的谱系关系接续了起来,证实了“仰韶文化”的本地起源,认清了“仰韶文化”的内涵,建立起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面向内陆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也为后来阐释面向海洋的以磁山、裴李岗文化为源头的文化谱系埋下了伏笔;还提出了元君庙 M451 代表的遗存属“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认识。这些认识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及三代考古的重要基石。

## 二、中国考古的坚实基础

张忠培先生开展了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奠定了东北考古的知识基础,开创了“求大同、存小异”的考古合作模式。

1958—1960年,他在吉林市郊发现了西流松花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一”(即左家山下层文化)、“文化二”(即青铜时代的西团山文化)和“文化三”(即汉夫徐时期的东团山文化)<sup>[4]</sup>,并于1962年调查和发掘了含西团山文化的两半山遗址<sup>[5]</sup>。在嫩江流域的白城傲包山清理了三座“细石器文化”墓葬,辨识出长岗子和东山头两类青铜时代遗存<sup>[6]</sup>,并在1974年主持的大安汉书遗址发掘中确认了二者的相对年代,命名了“汉书一期”和“汉书二期”文化<sup>[7]</sup>。这些工作揭示出新石器时代的东北地区可划分为南、北两个文化区,确认了西流松花江和嫩江流域青铜时代的文化面貌。

1971年,他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主持了乌苏里江流域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发现了三江平原前仰韶时代的小南山文化<sup>[8]</sup>,并沿乌苏里江从饶河至虎林做了调查,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至唐渤海时期的多处遗址<sup>[9]</sup>。1975年,他主持了黑龙江东宁团结遗址的整理工作,区分出团结文化和靺鞨文化<sup>[10]</sup>。同年,他还在内蒙古兴安盟和通辽市进行考古调查,认识到此地交织着嫩江流域、西拉木伦河、辽河、松花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他主持了奈曼旗沙巴营子城址的发掘,发现了战国晚期至西汉的遗存,为寻找年代介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战国晚期之间的东胡遗存提供了参照<sup>[11]</sup>。1986年,他主持了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的发掘,揭示出嫩江流域夏至西汉时期的小拉哈文化、古城类型、白金宝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sup>[12]</sup>。1996—1998年,他主持了内蒙古赤峰大山前遗址的发掘,揭示出夏家店下层、上层和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强调以路土为线索寻找不同时期的古代地面<sup>[13]</sup>。1999—2001年,他任队长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对赤峰以西的阴河、半支箭河下游至英金河流域进行了区域性考古调查,本着“求大同、存小异”和让实践检验是非的态度,获得了700多处古遗址的资料,培训人才、探讨方法,成为区域性调查研究的范例<sup>[14]</sup>。

他领导了系列田野考古实践,在华北、西北等地树立了多个重要剖面,成为先秦考古的标尺。

1975年,他参与指导了湖北江陵县纪南城的“考古大会战”,发掘了春秋中晚期到战国中期的松柏区30号宫殿建筑遗址<sup>[15]</sup>,使东周时期“南国第一大城”呈现在了世人面前<sup>[16]</sup>。1976年,他指导了河北燕下都的发掘,理清了易县商至汉代的文化面貌和燕下都遗址的分期。1979—1981年,他带领吉林大学张家口考古队,对河北张家口的筛子绦罗、庄窠、三关等遗址进行发掘,在蔚县境内壶流河沿岸展开考古调查和试掘,厘清了该地区仰韶时代至周以前的诸考古学文化面貌<sup>[17]</sup>,在苏秉琦描述的链接关中西部、晋北、内蒙古河套地区、冀西北和辽西地区的“Y”形文化带<sup>[18]</sup>的核心交接点上树立起重要的标尺,展现出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吸收融合与斗争的图景<sup>[19]</sup>。1980—1981年,他领导的晋中考古队,发掘了山西太谷白燕遗址<sup>[20]</sup>。1982—1983年,在山西汾阳、娄烦、孝义、离石、柳林进行了考古调查、试掘,发掘了汾阳杏花村遗址,建立起半坡文化,西阴文化,义井文化,白燕一期文化,杏花文化,白燕四期遗

存,二里岗上层末期至殷墟时期,柳林高迪H1类遗存、东周时期遗存共计八期24段的文化序列,认识到太原盆地西周以前的考古学文化存在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预见吕梁山半坡至夏代早期文化的传承关系应与太原盆地一致,辨识出吕梁山高迪H1类遗存的出现引起了该地与太原盆地文化发展的分野<sup>[21]</sup>。1987、1989年他任领队的忻州考古队两次发掘了山西游邀遗址,展示出忻定盆地龙山时代晚期以杏花文化侧装釜手鬲为标识的游邀早期遗存被属永兴店文化的以正装釜手鬲为代表的游邀中期和以正装釜手高脖鬲为代表的晚期遗存代替的情形<sup>[22]</sup>,指出龙山时代后期与忻定盆地隔恒山相望的桑干河流域“被吸收了游邀以高脖鬲为代表的文化及先商文化的某些因素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占据了”<sup>[23]</sup>。1987年,他任甘肃东灰山遗址考古领队,在河西走廊上揭示出一处夏商时期的四坝文化墓地,这次发掘发现的炭化麦粒、日晒砖等遗存加大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的信息量,为先秦时期“一带一路”区域的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点<sup>[24]</sup>。

先生指导了大量田野考古课题,足迹遍布长城内外、江河之滨,在全国各地辨识了大量新发现,为考古工作指明了方向,是中国田野考古的参与者和研究者,更是中国田野考古的重要指导者和带头人。

他将内蒙古发现的庙子沟文化置于西阴文化解体后的背景下,指出内蒙古中南部定将发现相当于马家窑文化时期连接西阴与庙子沟文化的遗存;认为庙子沟文化的庙子沟、阿善三期、海生不浪等类型的后继者演化成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勾画出内蒙古中南部仰韶至龙山时代谱系研究的蓝图<sup>[25]</sup>。2001—2009年,他组织内蒙古、陕西、山西的考古工作者,聚焦于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在他的指导和推动下,陕西神木新华<sup>[26]</sup>,内蒙古岱海地区忻州窑子墓地、小双古城墓地、水泉墓地<sup>[27]</sup>,山西省吉县州川河流域<sup>[28]</sup>等的考古发现不断地被刊布出来,建立起河套地区后冈一期文化至东汉时期17个阶段的文化序列,填补了山西此区域考古学文化发现的空白,丰富了陕西和内蒙古的材料;生动地阐释了半坡文化向东挤压后冈一期文化、杏花文化与陶寺M3015类遗存的对峙等课题,提出了夏商时期的朱开沟蛇纹鬲遗存的源流,西岔、高迪、桃红巴拉等遗址晚商至战国时期遗存的发现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概念提出的挑战等问题;

敏锐地发现使用朱开沟方体单把鬲的居民与殷墟晚期时的高迪H1类遗存的居民的年代和文化谱系虽存在差距,但生业方式均与牧业相关,是研究河套地区牧业起源与发展的重点<sup>[29]</sup>。

先生从文明研究的高度出发,认识到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多次指导浙江良渚遗址的发掘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2007年1月22日,他在考察良渚葡萄畷现场后指出“良渚文化的玉器是中国玉器的代表,在国内空前绝后,在世界独一无二。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浙江的角度,文化遗产都不能缺了良渚文化这一环”<sup>[30]</sup>。2007年,他数次亲临第一线,为良渚城墙和城址的发现提出了关键性的指导意见。2007年11月16日,他提出要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持续性考古,要有“百年谋略、十年设想、三年规划”,成为良渚城址的发现、发掘和保护的指导思想<sup>[31]</sup>。1994年,他就指出,良渚文化的起始是在公元前第4千纪晚期,延续到公元前第3千纪前半<sup>[32]</sup>。2006年,他在上海召开的“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上提出,年代上晚于良渚文化、早于马桥文化的“钱山漾一期文化”和“广富林遗存”可分别称为“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sup>[33]</sup>。这一认识在广富林遗址和钱山漾遗址第三、四次发掘中均得到验证,在环太湖流域进一步完善和建立起了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的编年序列,推动环太湖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进入新阶段<sup>[34]</sup>。

2009年和2011年,他两次到江苏张家港东山村指导田野考古工作,认识到东山村崧泽文化遗存所表述的社会应是“良渚文明之源”,他认真对比东山村遗址具有西阴文化形态特征的马家浜文化尖底瓶(M97:7)和具有本地文化特征的陶罐(M97:8)的质地,得出了两件陶器都是使用本地黏土制成的结论,得到了陶器化学成分分析证明。他还指出,二者“是用不同批次的本地黏土(取土的具体地点或有区别)制作和不同窑次烧造的”,令陶器的研究进入了更贴近历史真实的具有“分子水平”的新领域<sup>[35]</sup>。他欣然为《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作序,成为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序文。

上述仅撮举了张忠培先生的部分田野考古工作,无法涵盖他的田野考古历程。但是,我们可以窥见,他的田野考古工作生动地诠释了“挖一个好遗址”与“挖好一个遗址”的辩证关系。他通过一生的实践,为中国考古学总结出了代表中国

水平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被形象地比喻为“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相结合<sup>[36]</sup>。张忠培先生身体力行、创造性地开展和领导了田野考古工作,从田野考古资料中压榨出丰富的信息,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三、中国文化的谱系规律

张忠培先生坚持实事求是地探索遗存间的内在联系,把田野考古获得的资料纳入到学术课题中,从“人、遗存、时、空”四维的视角入手,纵横求索,科学地发现和表述了蕴含中国文化基因的谱系结构。

他高举苏秉琦区系类型思想的旗帜,指出“中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化阶段存在种植农业的发明和渔猎采集经济的发展两条道路<sup>[37]</sup>,总结中国新石器时代以华渭、泰沂、燕山南北、江汉平原、长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五个亲族文化区<sup>[38]</sup>,提炼出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奠基作用的五个考古学文化谱系<sup>[39]</sup>:

#### (1) 华渭地区:

老官台→半坡→西阴→半坡四期→泉护二期→荆村→东关→三里桥<sup>[40]</sup>

└→客省庄

#### (2) 泰沂地区:

磁山·裴李岗、后李→北辛→后冈一期→大汶口→龙山<sup>[41]</sup>

#### (3) 西拉木伦河及燕山南北地区:

兴隆洼→红山→小河沿

└→赵宝沟

#### (4) 长江中游地区:

油子岭└

彭头山└→城背溪——→大溪└→屈家岭——→

└→皂市下层→汤家岗└

石家河→后石家河

#### (5) 长江下游地区:

罗家角→马家浜→崧泽→良渚

他发现了老官台文化转变为半坡文化和黄河流域空三足器的兴起<sup>[42]</sup>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间节点,界定了仰韶时代<sup>[43]</sup>,成为划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前仰韶、仰韶和龙山时代的界标<sup>[44]</sup>。

先生从陶鬲的谱系研究出发,深刻分析了新石器时代与夏代的年代关系及考古学文化特征在夏、商王朝界标研究中的历史意义。1983年,他得出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的上限应进入夏纪年的认识<sup>[45]</sup>。2009年,他结合对白燕四期、游邀晚期、齐家<sup>[46]</sup>、三里桥等文化的研究,提出在甘青地

区、晋陕高原及中原地区存在龙山时代之后、二里头文化之前的夏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他指出,只要承认“郑亳说”,便可进一步认为在二里岗H9:36所代表的年代范围内发生了灭夏和建亳都的事件,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区分先商和商王朝的标志<sup>[47]</sup>。

他指出夏商时期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采取了排他式殖民的扩张策略。在二里头文化的冲击下,山西运城盆地的三里桥文化或其后裔发展为东下冯文化;渭河流域的客省庄文化,一部分北上至河套地区,一部分进至“西山坪期”<sup>[48]</sup>。商王朝建立后,二里岗文化呈现出迅速扩张、广泛分布的景象,关中西部在二里岗下层阶段被商文化占领,关中西部在二里岗下层阶段被商人控制。商文化积极影响但始终未能占领晋中地区,晋中地区发展出了同一谱系并与商文化联系紧密的白燕早商遗存和杏花村晚商遗存,成为商文化在西北方的屏障。晚商时期,晋陕高原还有来自北方草原的柳林高迪H1类遗存与商文化抗衡。殷墟一至四期时,关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在二里岗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老牛坡晚商遗存向东退缩;而关中地区出现的郑家坡文化不断繁盛,很可能是周文化的直接来源<sup>[49]</sup>。辛店文化于殷墟一期时扩展至了陕西扶风境内,形成了与郑家坡文化关系密切的刘家文化<sup>[50]</sup>;周文明在复杂而不安定的文化背景下,摒弃了排他式的殖民扩张策略,建立了周王国,实行了封建制<sup>[51]</sup>。

他通过研究西周晚期输入制铁技术使中国在东周时期跨入铁器时代的背景,认识到:东周时期产生的巨变既变革了西周封建的政治制度,更于文化上产生了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以老子和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华夏文化与精神文明,使非华夏族与华夏族谱系族群的文化认同不断紧密。这一巨变,为秦确立“百代皆行秦政制”的帝国政体奠定了基础,也“正因为春秋形成的华夏族及其文化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才使中国成为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和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形态一直存在下来。这历史的积淀如此深厚,以致成为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sup>[52]</sup>。

先生对文化演进的研究不仅包括中国上万年的文化起步到秦汉专制帝国的宏大叙事,更有大量对中国先秦时期各地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的具体研究。他认为,考古学文化区系

类型论的实质即考古学文化谱系论,谱系不仅具有继承、源流的含义,也存在诸文化间的交往、渗透、借用的含义<sup>[53]</sup>。他提出了关于考古学文化区和考古学文化结构的两个重要意见:其一,考古学文化区可分成相同起源的诸考古学文化的区域即“亲族文化区”和分布于同一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因相互联系和影响而形成的共同文化区域即“历史—文化区”<sup>[54]</sup>;其二,任何考古学文化都是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sup>[55]</sup>,从而发展和深化了苏秉琦区系类型思想。

他从研究考古学文化入手,探索诸文化内部和其间的时、空、谱系关系,“以物论史”地论述考古学文化的演进历程,指出文化演进的过程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文化演进的规律是“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杂交之道<sup>[56]</sup>。

2016年5月6日,张忠培先生在故宫博物院系统地阐述了“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的认识,为以考古学文化的演进研究探讨考古学文化及其表述的社会构建了平台。他指出,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是指考古学家从已经界定的考古学文化中观察到的物质文化和物质遗存所表述的精神文化。但他更谨慎地强调,考古学家研究精神遗存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人类的诸多精神、思想、理念是无法用物质来表达的。

由是,张忠培先生由“形而下”至“形而上”,阐述了由考古学文化演进研究而“透物见人”的途径,阐明了体现人类普遍规律的文化演进论。

张忠培先生站在时代的前沿,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向人们强调:“离开当代文化或当代传统文化平台,去鼓吹继承发扬已被历史淘汰的传统文化,就是复古,是文化的倒退;站在当代文化或当代传统文化平台去鼓吹文化稳定,则是不思进步,也会导致文化倒退。我们既要站在‘一定时代’上,又要追求新的文化‘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打破‘一定时代’所呈现的文化平衡。只有文化的进步,才有时代的进步。”

大道至简,路在脚下。知之者,甚众;行之者,寥寥!张忠培先生由“实事”而“求是”的探索,达到了“通古今之变”的学术高峰,指明了考古学的中国道路,为人们奉献出饱含历史深情、引领当下、面向未来的考古学思想。

[1]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2]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

1983年。

- [3]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华县泉护村》,科学出版社2003年。
- [4]张忠培:《吉林市郊古代遗址的文化类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年第1期。
- [5]a.张忠培:《两半山遗址调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年第2期;b.张忠培:《吉林两半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4年第1期。
- [6]张忠培:《白城地区考古调查述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年第1期。
- [7]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等:《大安汉书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 [8]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2期。
- [9]黑龙江省博物馆:《乌苏里江流域考古调查》,《文物》1972年第3期。
- [10]张忠培:《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进程》,《中国文物报》2009年7月31日第7版。
- [11]张忠培:《论内蒙古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
- [12]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等:《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科学出版社2009年。
-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1998年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3期。
- [14]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
- [15]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勘探与发掘(下)》,《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 [16]湖北省博物馆等:《艰辛四十载再现纪南城》,《中国文物报》2015年12月18日第7版。
- [17]张忠培:《论蔚县周以前的古代遗存》,《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文物出版社1989年。
- [18]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
- [19]张忠培:《张家口地区考古的重要收获》,《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年第4期。
- [20]a.晋中考古队:《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3期;b.晋中考古队:《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二、三、四地点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3期。
- [21]国家文物局等:《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9年。
- [22]忻州考古队:《忻州游邀考古》,科学出版社2004年。
- [23]张忠培:《滹沱河上游和桑干河流域的正装双鬲》,“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3年。
- [2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 [25]张忠培:《庙子沟与大坝沟·序》,《中国文物报》2003年

- 11月21日第7版。
- [2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年。
- [2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岱海地区东周墓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
- [2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吉县州川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7年。
- [29]张忠培:《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文化、生计与环境研究课题的进展与今后的任务》,《草原文物》2016年第2期。
- [30]刘斌:《张忠培先生与良渚》,《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 [31]同[30]。
- [32]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文物》1995年第5期。
- [33]张忠培:《解惑与求真——在“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 [34]张忠培:《钱山漾——第三、四次发掘报告·序》,文物出版社2014年。
- [35]张忠培:《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序》,文物出版社2016年。
- [36]赵宾福:《学术张忠培:考古人生八十年》,《中国文物报》2014年10月21日第3版。
- [37]张忠培:《史前考古中几个被淡漠的问题》,《中国文物报》1999年12月1日第3版。
- [38]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探索与思考——〈史学史研究〉王晖访谈记》,《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
- [39]张忠培:《中国史前时代研究的一些认识》,《北方文物》1999年第4期。
- [40]张忠培、杨晶:《客省庄与三里桥文化的单把鬲及其相关问题》,《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
- [41]张忠培、乔梁:《后冈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 [42]张忠培:《黄河流域空三足器的兴起》,《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 [43]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1期。
- [44]张光直、徐莘芳:《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 [45]张忠培等:《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1)》,文物出版社1987年。
- [46]张忠培:《齐家文化的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第1、2期。
- [47]a.张忠培:《关于二里头文化和夏代考古学遗存的几点认识》,《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b.张忠培:《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国·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 [48]同[40]。
- [49]张忠培、朱延平、乔梁:《晋陕高原及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结构分析》,《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50]张忠培:《陕西史前文化的谱系与周文明的形成》,《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 [51]同[40]。
- [52]张忠培:《变革时代下的两周时期玉器与玉文化》,《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 [53]张忠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20世纪的历程》,《故宫学刊》2004年总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 [54]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
- [55]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物出版社1986年。
- [56]张忠培:《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南方文物》2012年第2期。

## The Profoundness of Chinese Archeology: Mr. Zhang Zhongpei's Theory of Cultural Evolution

DUAN Tian-jing

(College of Arche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Abstract: Mr. Zhang Zhongpei had always advocated field archaeology and insisted on letting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ake the lead. He systematically built the framework of the lineages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based on which, he proposed the theory of cultural evolution that conformed to China's real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embodied the common law of human beings. With his solid and high-level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as a base, Mr. Zhang continued to explore new research frontiers to form a grand academic framework. He creatively carried out and led field archaeological project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He discovered and expounded a lineage structure of Chinese cultures, demonstrating the profoundness of Chinese archaeology.

Key words: history of archaeology; evolution of culture; Zhang Zhongpei